

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作者：任放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

1964-1965年，施坚雅发表了3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论，对中国市场体系初步提出了一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1, 2,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论，对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市场变迁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初步奠定了施坚雅模式。这一时段，惟第3篇论文，专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商品流通方式和市场共同体等问题，属于施坚雅模式的论证部分。施氏炼，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又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可以划分开的每一个阶关注”。他强调，“对中国农村1949年以来的充分阐释必须依靠对前现代农民交易活动的优先分析”。可构架其理论模式的学术平台。（注：参见〔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第1-2页。）这一模式在197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完善。（注：G. William Skinner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译本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一种结构一功能分析模式，从“施坚雅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即可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前者主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以《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为代表帝国晚期的城市》为代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是集市体系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两者均以德国地理学家中心地学说为主要研究方法，同时吸纳了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Gilbert Rozman)的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美级一规模学说，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屈指算来，今年正是该模式诞生40周年。值此之际，剖析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以及该研究的拓展尤其是方法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至于施坚雅模式述。

一、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以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为中心

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3个方面，下面

近代市场史是施坚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突破口，并由此奠定了著名的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的施坚雅模式必须联系中国近代市场史的发展历程。按照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属于市镇(town, 另译集每标准市场(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标准市场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至于中间市场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与基层市场和中间市场相比，中心市场“通常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面，是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种经济中心地的居民点，分别称之为“标准集镇”（又译做“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每布意味着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6-8研究重点是中国农村基层市场，但其触角已经延伸到了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将它们归之于“中心地类型体系理论埋下了伏笔。在某种意义上，区域体系理论可以说是以城市化为切入点的广义市场史研究。

施坚雅模式在中国学者中获得了广泛赞誉。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是研究中生了广泛的影响。（注：兰林友：《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结构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运用“中心地理论”和“巨区理论”，把不同的基层市场视为层级性的共同体”说以及地理学的正六边形结构。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被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者大”（注：李金铮、邹晓：《二十年来中国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初业社会的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最具有开拓性”。其关于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专论，“重点论述了20世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地将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材料和现代地理学的奠基理论——中心地理论结合，运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之后，学术界在对中国民间基层商业社会进行的各方面研究中开拓了视野，取晋以来各个时期的部分地域的商业社会，尤其是基层的商业社会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地研究包括中国历史上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中国各个朝代各个地区市镇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专业国时期陕北高原与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发展和市场发育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这方面的研究首推美国学者施坚雅。征分析》，《学术论坛》2003年第2期。）回顾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尽管相关变量之间关系时，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模式”，对于中国学者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无疑是‘（注：姚兆余：《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从实际情况看，施坚雅模式对中国学者的近代市场史研究有不同层面的影响。只要随手翻阅王笛著作的六边形构图，即可知晓施坚雅模式对其研究课题的重要影响。运用施坚雅模式，王笛详尽分析了有清一与市场网络，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农村定期集市的集期、高级市场与城每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1-254页。）单强称，研究，为其研究江南区域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型。（注：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第页。）此外，诸如近代华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与农民，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从农业剩余角度探讨现代化的滞后问题，近代云南及广西的农村市场，清末新政工商改革，近代广西对外贸易与市场现代化，辛亥革命与近代农村社会变迁等等不同地域、不同角度的研究，也引用了施坚雅的成果（注：参见刘云明，

笔者曾对施坚雅关于“非正式管理”的研究予以评述，并运用“非正式管理”概念，对明代至晚清考察。依拙见，施氏的这一研究具有相当的开拓性，其学术上的多方面启迪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当然，并多于实证研究，显得有些空泛。如果施坚雅能够对他所划分的某一个或几个“大区”或“亚区”进行个案基础，那么其结论或许更加具有说服力。（注：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包伟民、赵世瑜对施坚雅“非正式管理”研究亦有所关注，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江南市镇社会结构的嬗变时，综述了施坚雅等人的相关观点，并对江南市镇的社会组织做了全面论述。赵世瑜与权力网络（体系）是一致的，但施氏的兴趣在于以市场的维度进行社会研究，“他并不注意市镇权力必然把市镇上的士绅或商人视为官府和乡民双方的代理人，从而无法说明市镇与乡村及与城市的权力运作来，传统市镇多被研究者视为市场网络中的一级经济中心地，人们习惯于从商业角度总结其特征。市镇‘从发生学和一般特性的意义上判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很难想像它能脱离帝国的权力支配体系、宗地’。无论如何，它都需要孕育和形成一个自我管理（或者说自治）的权力机制，来协调市镇内部的各种外界压力。”赵世瑜以近代浙江湖州双林镇为研究个案，通过光绪庚子年即1900年发生在双林镇上的风波的重新配置，剖析了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以及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一崇善堂的核心作用，凸显了区域社会的权力变迁轨迹。（注：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207-222页。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

在城市史领域，施坚雅模式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系施坚雅主编的一部跨学科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案研究，反映了地方史研究的新潮流。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最重要部分是施坚雅本人的5篇论文，分别是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国社会的城乡》、《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个整体，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真正突破。”（注：陈君静：《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初期。）该书的校译者陈桥驿认为，施坚雅开创了城市史研究的新方向。另有评论人称，该书的创新之处在比较研究法、中心地理论凸显城市史研究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城市史的定性描述手段的城市》，《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此文即中华书局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之“后记”。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标志，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终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囿于行政区域的局限，创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理论。要言之，每一宏观区在资源、交通、市场等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有优势。就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而言，中心地区小于边缘地区市场规模以及商业服务水平而言，中心地区则大于和高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依次减弱趋势。有中心都为若干低一级的经济中心所环绕，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级。城镇的分布因之呈现为一种层级结构成反比。从地理空间上看，整个区域的市场范围由中心向边缘可划分为众多彼此互相衔接的等距离展开的密度、劳动分工、城市腹地等因素，并结合流域分布图，施坚雅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存在9个具有经济史下游、长江中游（施氏曾从长江中游分出长江—赣江区域作为另一区域）、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区域是有序的整体，均有独特的结构功能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周期，这种周期应该取代王朝更替、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石。（注：施氏强调以区域经济发展周期取代王朝周期的观点过于绝对。正如历史也存在多元性，王朝兴衰周期不失为一种考察中国历史真相的方法。另有学者指出，施坚雅模式撇开政区史认识的偏差。参见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中国学者高度重视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对区域体系理论给予积极评价。王笛指出，施坚雅“将中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区域系统分析出发，“建构了传统中国的经济等级结构与城市贸易体系，形成别具一格的理论框架，在国（注：龙登高：《施坚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行龙认为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也是对晚清城市史研究做出的最大贡献。（注：行龙：《人口流动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述评》，《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经济史与社期。另有研究者称，是著以城镇为视角，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解释。参见郑也夫《古代中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杨天宏认为，施坚雅有关晚清城市系统的研究，不仅完善了中心地理论，而且“献”。（注：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5

施坚雅倡导的区域研究方法，深刻影响了大批中国学者的城市史研究。单强关于江南城市市场的研究级、中级市场基础之上的是城市高级市场，该体系又可分为3个层次，区域性大都市、地区性大城市和—研究》，第71页。）。有学者运用区域体系理论考察城市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指出：从城市化的角度看海为中心的南北沿海、东西沿江的两条现代化港口城市带。再把考察的范围扩大，“把那些非通商口岸的‘中心地’包括进来，就更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分布不均匀的状况”。根据施坚雅将辛亥革命前的中巨西沿江的城市（包括镇、中心地），即8大区域中的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及全国8大区域总数（1779个）的75.32%。由于初步现代化的中心城市与内地城市在区域和地理上的不平等同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于辛亥革命的回应有较为强烈。（注：田玄：《中国城市现代化动向的不城市革命运动及城市的回应的历史审视》。《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此外，学者们在从事清末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不平衡性、近代东北城市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埠、单一城市的近代化历程、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等等的研究时（注：参见蔡云辉《中国近代开埠1995年第2期；忻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涂文学《对立与并《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乔志强、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林》1998年业的衰落与沿岸早期城镇带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熊月之、沈祖炜《长江沿江城市期；张东刚《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宏观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郑忠《试论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心，2002年；黄新华《湖州城市近代化及其发展滞缓的原因探析（1840-1937年）》，（硕士学位论文）002年；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第120-121、220-221页。），都引

近年来, 有些中国学者力求突破施坚雅等国外学者偏重经济地理学的城市史研究方法, 尝试用跨学科合研究。尤为注重结合中国国情对国外城市研究理论予以修正, 提出创见。有研究者对施坚雅主要按照自按区域划分中国城市的标准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其参照数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自然的、地理始, 部分中国学者在近代区域城市史领域展开多角度研究, 或以某一省区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或以城市群对象, 并对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静止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 扩大了研究视野, 并突破了施坚雅的区域城市研究模式” (注: 何一民望), 《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另参见隗瀛涛、谢放《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却步构想》, 《代中国城市研究: 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 《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这一评论似有拔高之: 力作仍不多见, 而且研究对象和方法也亟待深化。迄今为止, 中国学者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并未超越20世纪史” (注: 即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皮明麻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 中国社会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相比, “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基本还处于条块分割式的功能分析阶段, 习惯把城市发展干的几个部分, 却看不出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 (注: 杨念群: 《美国中实处境》, 《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国内的城市史研究虽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但在城方面, 在对城市进行全面性的、群落性的研究方面, 施坚雅、滨下武志等“国外的同类研究明显领先于中发展趋向之我见》,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如果说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市场史和城市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 那么这一影响同样反映在近代人 与市场史研究、城市史研究联系在一起, 确切地说, 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从属于他的市场史研究和城市

1995年, 朱政惠结合施坚雅关于清代四川人口的研究, 撰文分析国内人口史研究现状, 指出: 施坚雅 计算机精密计算, 通过纵横的比较, 空间模式和人文地理的比较, 作出了对四川人口的新推断”, 进行了 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在于, 人口史研究“必须作深入、扎实、打‘井’式地探讨, 必须作一些脚踏实地的 史学寻求突破的路数。相比之下, 中国人口史研究欠缺“施坚雅那种对具体地区、具体村落、具体问题的 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少学者在讨论有关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代化、近代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性、 集市和区域市场的变迁、清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近代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民国时期城市居 雅的观点和数据, 表明对其人口史的研究结论予以首肯。(注: 参见涂文学《洋务运动与晚清城市社会近 期; 王瑞成《中国近代城市化内容探析》, 《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1期; 谢放《孙中山与中国城市近 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张尚武《长江三角洲城镇 》《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1期; 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数量分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体系理论关于城市化的论述, 认为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大体上存在3个阶段: 五口通商至甲午战争 十年代, 呈现了人口流动由少到多、城市化由慢到快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 行龙给出了不同时期城市 的超越与定位——“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 述也引起某些中国学者的关注。(注: 郑也夫: 《古代中西城市化与民间社团之比较》, 《北京社会科学 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即使对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提出尖锐批评的曹树基, 也对施坚雅研究的学术价值给予肯定。施坚雅 人口等级模式的基础。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因为施氏以县级数据为基础的清代四川人 多、可靠得多。从方法论上讲, 施氏的这一研究通过人口密度、人口增长、家庭规模、性别比等四方面 地鉴定了数据的真伪。这一研究为其他的类似研究提供了范例”; 尽管存在错谬, 但是“施坚雅对四川人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6、15、266、273页。在此前的1篇论文 的一流学者”在中国人口史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特别提及施氏《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 文对清代四川的人口统计制度、人口密度、人口增长、户均人口和性别比做出了“相当精彩分析”。参 低水平的资料编纂? ——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的整体资料, 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鸟瞰中国人口。“施坚雅最早展示了从基层开始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可 数据的仔细审读, 施指出何炳棣过于信任了清代保甲人口登记资料。”施坚雅的研究表明: 研究中国历史 级户口数, 然后着手建立府级、省级乃至全国的户口数。正是基于这一思路, 曹树基研读了中央政府的多 时人著述, 以“府”为基本单位完成了从明代到民国初年的人口计算。(注: 曹树基、陈意新: 《马尔萨 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 《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曹氏的相关研究, 参见《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 期; 《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 《清代江苏城市 2年第4期; 《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与陈意新合撰), 《学术界》2003年第3期。)

二、施坚雅模式的局限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学者在运用施坚雅模式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际, 对该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种种批评, 上文对此 总体上看, 中国学者对施坚雅模式的批评是围绕近代中国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展开的, 主要体现在二 指斥施坚雅模式与历史实际不符, 或通过实证研究修正施坚雅的某些结论; 二是理性层面, 即对施坚雅模 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由此引发的深层次思考是: 第一, 这些批评是否成立, 或者是否有力, 是否需要提出 否可以发现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足之处, 并进而寻求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

从相关检索看, 中国学者多从经验层面批评施坚雅模式。这种批评包括史料运用的不当、数据统计的 某些硬伤: 如将1937年的宁波作为农业现代化影响下标准市场业已消失的典型, 所据史料需要推敲; 崩 谬, 遗漏了资州、眉州等州治和商业中心。当施坚雅着手18世纪或19世纪的城市人口比重分析时, 其依据 四川人口的研究堪称经典, 但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 即将四川的经验作为普遍真理加以推广, 得出了不 观区域理论与迈入近代的贵州》, 《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包伟民主编: 《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 版, 第90页注(168)。曹树基: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 第6、15页。)施坚雅在史料使用或理 社会结构的解释效力。有些批评虽然言之成理, 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例如, 一些学者对施坚雅的人 疑。吴筑星认为施氏著作中的成套数据的完整性令人耳目一新, 其出处和计算方法却令人疑虑。曹树基

未予披露，使得他的工作无法复原，也无法检验，从而令人怀疑施坚雅所用城市人口资料的真实性。城镇化水平（人口比）的估计偏低。姜涛对施坚雅的人口史研究结论做出某些修正，指出施坚雅估算1843年1893年上升为6.0%，这一统计结果大大低于实际水平。原因在于施氏统计的城市中心地总数偏低，他对非也偏低。清代中叶直到太平天国革命之前的城市人口比重，总体上不低于宋代的水平。（注：吴筑星：《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陈晓燕：《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变迁》，《浙江学刊》1996构——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洋施坚雅的研究视野，似乎苛求。例如，有人指出施坚雅的区域市场体系过多关注各市场内部关系，对市场了施坚雅的研究重点是区分不同的经济区，进而勾勒出不同的区域发展周期，而不是关注经济区之间的批评施坚雅对中国各区域之间在经济地理、商贸互动、经济特征、市场发育、人口构成、管理机制、价格从历史资料和研究现状看，这一要求不仅施坚雅做不到，中国学者也做不到。当然，施坚雅的理论有较多偏差（例如施氏以居民2000人作为中心地的选取标准，这与历史实际不符，应以城镇的功能来选取中心地态相差甚远；陕北许多地方的集期与施坚雅的分析有出入等等），需要中国学者进一步展开区域史的实证（注：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郑成林：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任放、杜七红：《施坚雅：会科学》2000年第5期。谢庐明：《客家文化视野中的清代赣南农村市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渭河谷地过渡地带商业社会初探——陕西同官县的个案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注：例如，有人批评施坚雅没有将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和其他的城市区分开来，从而妨碍了对通商口岸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6期。又如，苑书义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对施坚雅模式提出质疑，认为该级的划分也不够科学严谨。施坚雅认为晚清华北只有1个中心大都市，6个区域性都市，18个区域性城市，中心集镇。苑书义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华北地区传统城市以北京为核心，沿着纵横交错的官道和河网向区都围绕一个区域城市运转，经济区的大小取决于区域城市的吸引、辐射和中介作用。并通过大小不同、参见陈鹏鸣《评〈艰难的转轨历程〉》，《河北学刊》1998年第3期。实际上，苑书义等人的观点恰恰有近代中国城市化历程时，不提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影响，这一做法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矫枉过正。施氏勘地，似有忽略中国城市作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倾向。20世纪70年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拟定“中大型科研课题，由李国祁、张朋园主持，打算借鉴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按照施氏划定的9大区域展开系制，最终的系列成果（著作）仍以政区（省份）为研究单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施坚雅模式在中国城市方面，存在着某些障碍。

中国学者批评施坚雅模式的一个焦点，是其六边形市场圈。有学者指出，在创立模式的过程中，施坚雅用正六边形叠加而成的空间分布图来分析中国千差万别的市场等级，不能不说有些牵强和生硬。例如，正合，该地区集市多呈一种随形的网络结构分布，集市社区的界限较为模糊。又如，江南市场的空间布局与场区域并非一个标准的正六边形。最接近理论模式的是六边形市场区，有时市场呈七边形、五边形、四边地貌的不均衡和交通条件的差异，导致6个基层市镇与中级市镇并非等距离分布。七边形或更多边的市场密度大的经济发达地区，少于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则存在于特定地区。其中，三角形市场区域较少见，常见场区域既然不是按照正六边形来布局，就必然有一些地区处于市场间的空白地带，这与施坚雅模式是相违是非正六边形的市场格局。施坚雅模式中，中级市镇、标准市镇、核心村之间的主干道是平原区的陆路。水路贯通的，实际上是江南水网在社会经济上的直接反映。（注：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1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第9-14页。丁长清、慈鸿飞：《中国构、商品经济与农村市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2页。任放、杜七红：《施坚雅模式与中国传统第5期。）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在指责施坚雅的六边形市场模型时，尽管有某种合理性，但它的差异性。理论模式的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它属于方法论，也不可能取代具体的实证研善、修正或推翻理论模式。这种常识性的失误被批评者貌似有力的声音所遮蔽。只要我们仔细审视施坚雅着清醒的头脑。施坚雅在方法论上对此做出了如下说明：“任何要了解市场结构的社会或经济范围的尝试出一些假设。所以，把市场结构作为空间体系来分析的一个理由是，在我将来能够从事市场的经济学和社设弄得更清楚。另一个理由是便于对变化的研究，因为很碰巧，只有在相关的资料按空间排列后，体系变性质才会充分表现出来。”他在谈及借助几何学和经济学建立理论模型的必要性时指出，“为了阐明作为有必要求助于一些简单的模型。为构成这些模型所作的假设中最根本的一点是，所讨论的背景是一个同分布。以无懈可击的几何学和还算合理的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考虑告诉我们，如果做出这样一种假设，是距离的坐标，好像位于把空间填满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在理论上，每个市场的服务区域也应该接近于一何地区——无论是几何学还是经济学都不特别具有中国性，因而在我能够检验这一命题的中国的6个区域的集镇都正好有6个相邻的集镇，因而有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尽管这个市场区域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个“作为稳定的空间体系的中国基层市场区域的模型”，这一模型亦可视为“基层市场区域与三个中间市六边形的市场区域，集镇位于中央，周围有一个由6个村庄组成的内环，一个由12个村庄组成的外环。“型要求从集镇辐射出6条小路。这些小路立刻成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动脉和静脉，这一体系的心脏则是在它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1-24页。施坚雅引述罗希著作关于正六边形是市场区域最有利必要条件，即“市场的分布应该使得：1. 在任何一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与任何其他区域内务也不少；2. 每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距市场的距离达到最低限度。第一个必要条件意味着模型中积，由于图形上所有各部分肯定在某个市场区域中，惟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三种‘填充间隔’的正多边形第二个必要条件说明一个多边形的边越多，在这方面它就越有效。换句话说，当沿着市场区域的边缘从扇形区域出现的差异最大，正方形区域处居中，六边形区域的差异最小。”施氏也提到杨庆堃认为中国农村形”。同上书，第61页，注(40)和注(41)。)显然，施坚雅将其分析模式定位为一种理论假设，正六边形氏已经提醒人们注意，他所谓的正六边形市场分布，在实际情势下会“受到地形地貌的扭曲”。于是，正形市场模型，而是研究者在探讨区域经济史的市场问题时，不要硬套六边形构图，应该依据史实，做出理个只在理论上成立、实际上往往以其他形态出现的六角形结构，而应该注重施氏理论在方法上的启迪作用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对于理论模式与社会实际之间的差异性，中辟诠释，这一诠释使得施坚雅面临的难题、质疑或批评大打折扣。克氏称，“理论的有效性完全不在于其正确，以及‘判断恰当’”。将理论与实际相比照，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同理论一致，并前同理论不相一致，从而也就不能得到理论的解释。不能被解释的事实，必须用历史的和地理的方法去弄清自然条件的干扰因素，由于这些原因使这些现实与理论相偏离，这些因素与理论本身无关，不能作为反对

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常正文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12页不同的认知层面，不能用片面的实证研究去匡测和评估理论模式的方法论意义。在面对理论模式时，提倡的。

从方法论角度看，施坚雅模式的内在矛盾是：如何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提出了再认识的问题。如果这一方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那么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历史分析模式就会变得局限，但仍然是有效的认识客观规律的工具，那么相应的历史分析模式就有其合理性。有人指出，施坚雅心地理论本身即有缺陷。克氏理论的数学起源是斯坦纳问题，即寻求总长度最短的道路网问题。诺贝尔发明，克氏理论只是现实中“一个可能的但不大会有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其“完全忽略了历史”。基于可能成功的。此外，在实证意义上这一模式有违历史事实，因而也是不成功的。（注：本刊编辑部：《‘究’学术座谈会纪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普里戈金的评论与名为布拉什的学者的观点极只是提供了将世界各地的差异进行对比的一种规范，“实验”证明实际的空间类型同理论预期不符。但学术价值，它们只是指出了这样的事实——理论模式与实际情况之间必然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能构成不在于指出克氏理论与实际不符，而是他将原因归结为克氏缺乏历史意识。事实正好相反，克里斯塔勒在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思考。只不过，历史研究不是探讨持审慎态度，认为城镇发展的规则或序列本身所包含的原理不能够仅仅通过历史研究来发现，事实也效的经济学规律”。不过，在讨论中心地的起源时，克氏注意到了历史上的集市和小镇。在解释现实与‘学角度，而且也从历史、地貌、民族、军事多种角度予以诠释。他特别指出在检验中心地理论的过程中，视的，不仅在特殊考察中具有专题性特点，在一般调查中，历史法首先使我们理解到某一体系的经济概念经济体系”。（注：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第6-9、174-175、185-186、317-3全十美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在于：当克里斯塔勒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推演出中心地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德国特拉斯堡、法兰克福）进行论证时，明显有别足适履之嫌。正如克氏著作的英译本前言所说，作者“为吻合，进行了太多的合理化解释工作以及任意的决定，这样，那些解释就多少令人不那么满意了”（注：汉原理》，“英译本前言”，第2页。）。这并不妨碍中心地理论成为现代地理学的四大基石之一。当然，为，克氏在建构中心地理论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从而使模式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应该说，这不是克氏因为离开了若干假设和前提，任何理论模式将丧失解释效力而没有意义。另有人批评克氏忽视了社会政治及人们消费倾向等因素对城市分布的影响，实际上克氏对这些因素均有深入思考，他提出的是一种关于人治、社会、经济、地理等多种因素。至于人们抨击最多的六边形结构单元，笔者认为它不是克氏理论的纯理论上推演出而非从现实生活中归纳出这一具有最佳经济效益的经济地理单元，这是最合理的人类社会的人以审美愉悦。诚如一位自然科学史家所指出的，克氏“六边形结构是一种理想化数学模式。鉴于理想化者则认为克里斯塔勒理论的局限性并非其致命弱点，而且正是由于他把理想化模式引进地理学领域而确实存在这样的局限性，克里斯塔勒的学说依然推动了对人类聚落类型和分级的研究进程，启迪后来的亨的更完备的理论。”（注：张大卫：《代序：克里斯塔勒与中心地理论》，载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允当的。

那么，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以及建基于该理论的施坚雅模式的真正局限性何在？如上所述，六边而且有其方法论的创新意义。尽管普里戈金批评克氏完全忽略历史失之偏颇，尽管克氏本人对历史方法有理论的最大缺陷。如果克氏能将德国南部中心地的研究由现实层面转向历史层面，将现实与历史贯通的更有力的支撑。因为经济地理单元的空间分布、中心地的结构及等级、同一组织系统中商品和服务的呈现形式。换言之，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体系（数量、规模和分布），中心商品的范围，生产成本与技术进步、区域、交通，在历史上有哪些特点，它们的变迁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历史上的中心地与现实生活中的是克氏应该回答的问题。如同克氏的六边形结构一样，对克氏提出历史研究的要求也是一种“理想图式”地理学家。在理想化状态下，六边形结构作为中心地原理的图式是最佳的，同样地，历史研究之于中心地克里斯塔勒在众多专业领域（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等）拥有渊博知识，但是在克氏的知识的是，这一知识缺陷在施坚雅身上得以重现。历史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深入正是施坚雅模式的真正局限所在实出发对中心地理论进行论证，那么施坚雅则是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出发从事同样的工作。作为人类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他与克里斯塔勒惊人地相似。在历史学的知识储备方面，对象——中国的市场体系和区域体系——而言，却是不够的。因此，在施氏的论著中，更多的不是扎实的在某种程度上，注重理论模式的构架，忽略详尽的史料分析，也许是美国中国史研究的通病。就此而言，病：长于史料的缕述和归纳，疏于理论方法的借鉴和创新。

施坚雅历史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深入主要表现在参考文献的种类和数量较为有限，尤其是第一手材料严重，结果如下：《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计有注释277个，其中直接引用原始材料者不到50个，大始材料主要包括日本人所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52-1958年版）、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及土地人口统计表》（1956年版）、有限的田野调查材料、不足30部的方志（与施氏官方统计数据。《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收录施氏5篇文章，计有注释257个，其中直接引用原始材料者不所引原始材料主要包括日本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1917-1920年版）、《嘉庆重修一统志》、《大：类可谓不多，所引方志数量也远远不够。当然，第二手材料也可用于历史研究，但是对于一位立意提出有原始材料，无疑会影响其研究工作本身的学术价值。例如，按照施氏的说法，1893年中国的8大经济区